

从“本土化”到“主体化” 的社会学发展路径

——基于费孝通学术历程的反思

刘亚秋

【摘要】费孝通的学术品格较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特征，经历了从社会学本土化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历程，他坚持“从实求知”“志在富民”，一生所践行的社会学之路都没有超出这两点。1990年代后费孝通对既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路径作了深入反思，提出社会学需要从生态层面进入心态层面，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可以说，百年中国社会学史，历代社会学人经由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阶段，已进入了找回和发展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阶段，这意味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和发展的新阶段。当下需要不同代际社会学人的共同努力，推进构建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费孝通 社会学 本土化 主体化 文化主体性

【作者简介】刘亚秋，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2)09-0073-18

一、既有研究与问题背景

有关费孝通思想的研究，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对费孝通的研究较为深入，有学者专注于对其早期的“差序格局”概念的深入探

索,如阎云翔、翟学伟、周飞舟等人的研究;^①有学者专注于费先生晚年的学术反思,对其“文化自觉”概念等做了深入讨论,如苏国勋、李友梅、赵旭东等人的研究;^②还有学者对其早期研究的西方思想资源做了进一步梳理,如杨清媚对费孝通和托尼思想的比较研究等。^③

在既有研究中,周飞舟在对费孝通学术历程的反思中,明确提出费先生晚年转向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转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即这一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周飞舟认为,费孝通晚年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④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费孝通思想转向与中国社会学路径转向的关联情况做一些初步探索。可以说,社会学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都是回应时代要求的产物。社会学学科本身就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产生的。无论是社会学的经典三大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还是其他经典社会学家如滕尼斯、齐美尔,乃至当代社会学家,如吉登斯、布迪厄等,他们的学说都是应对现代化问题的产物。无论是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还是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等,这些理论都试图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提供解释,目标是探寻建设人类美好社会的途径。社会学在中国的发轫也是来自这样一个相似的目标。严复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人物,他在1897年开始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为《群学肆言》。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肆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

① 参见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201~213页;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52~158页;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年第1期,第26~48页。

② 参见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2页;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2~19页;赵旭东:《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费孝通文化观对文化转型新时代的启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8~29页。

③ 参见杨清媚:《土地、市场与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从费孝通与托尼的比较出发》,《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218~240页。

④ 参见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第143~187页。

以所以治之方也。”^① 严复认为，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这个定位可谓抓住了社会学学科的主旨。他用“群学”概念来称呼“社会学”，带有很强的借鉴西方、服务中国以及中西对话的意味。

中国社会学的起步选择了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路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风气日盛，很多高校或开设社会学课程或设立社会学系，很多学者把社会学视为一门系统的知识学科乃至职业。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历程，诞生了各种学派和研究实践，如唯物史观社会学、乡村建设和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也被称为“社区研究学派”^②）、社会史研究等。本文以社会学的“中国学派”^③为例来说明中国社会学百年历程的发展特征问题。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他们明确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倡人物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提出纲领性主张：“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④ 而后，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廖泰初等人纷纷开始了深入中国的实践调查研究，并留下了迄今社会学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在这些人中，费孝通的研究历程尤为突出地说明了社会学如何在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中与社会发展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费孝通的学术生命经由民国时期社会学发端成长、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发展、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甚至到他生命的最后（2005年），他对社会学学科命运的思考从没有停止过，可见拳拳赤子之心。他的理论学说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样式，而且为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图景都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建议。本文认为，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标识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特点，其中之一便是社会学的从“本土化”到“主体化”的路径转向。

所谓本土化，是指社会学在中国发轫以来，中国学者提出的如何在中国

① [英] 赫伯特·斯宾塞：《群学肄言（上）》，严复译，朝华出版社2017年版，“序”，第5~6页。

② 参见陆远：《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70页。

③ 参见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 转引自吴文藻：《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第44~52页。

发展社会学的一种呼声和路径。在1930年代学者们就普遍意识到了这一问题,^①尤其是吴文藻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纲领,并形成了以吴文藻为首的社区研究学派,这一学派也被马林诺斯基称为“中国学派”,^②可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毋庸置疑,这样的本土化,需要借助西方的社会研究方法(也即科学精神),当然也包括西方社会理论的一些假设或思路,对于吴文藻而言,理论工具主要是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论,以及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

可以说,吴文藻提出的本土化路线强调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必须从实地研究开始,并基于此得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但没明确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问题。甚至传统文化这部分在多数社会学人那里,有被忽视的倾向。社区学派的多数研究是到实地中去,就中国社会理论层面,涉及的多是民间社会的“小传统”。以费孝通的早期研究为例,他1935年去广西瑶山做调查,1936年开始在开弦弓村做调研,乃至博士毕业归国后,他所做的禄村农田调研,大体都是这一路径。甚至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费孝通所做的大部分社会调研,都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即上述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路线,做到理论和实践的杂糅,理论符合事实,事实符合理论,而且也获得了新的综合,取得了对中国社会的新认识。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条主线索。综合看来,费先生的学术之路是从“从实求知”入手,他的问题意识是如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其早期研究偏器物层面,他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称这类研究为生态取向。尽管对中国社会的实地研究会不可避免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议题在费先生的早期研究中一直未能成为他的主要思考内容。

本文之所以提出“主体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一个路径/特征,是因为学者们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作用。^③这部分内容涉及费孝通晚年的社会学反思,尤其他在1990年代的《孔林片思》中提及儒家文化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问题。2003年费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区分出社会学的科学和人文取向,事实上就是区分

① 参见周晓虹:《社会学的中国化:发轫、延续与重启》,《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73~82页。

② 参见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思想访谈》,《民俗研究》1997年第1期,第16~34页。

③ 例如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16页;周飞舟近年来的探索,参见周飞舟:《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2021年第4期,第1~29页,以及周飞舟:《社会学本土化的演进与本体》,周晓虹、翟学伟主编:《中国研究》2022年总第28期,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3~20页。

了偏器物层面的社会学和偏文化主体性方面的社会学，后者将重心放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本文在这一意义上，提出社会学的“主体化”问题。同时，这一“主体化”，与费先生的社会发展思想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即费先生从来没有就学科发展而谈学科发展，而是将学科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时，意识到传统文化在认识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促进国际交流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他提到传统文化对促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乃至推进世界社会学发展方面的作用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化”是当下社会学学科史研究的一个主题，它关涉中国社会学本土理论构建这一深层次问题，是有待深入的研究议题。

二、社会学的本土化之路——取道西方、返回中国

中国化/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长期以来的一个主要特征。在本文中具体指以吴文藻为首的社区学派从中国的实地研究入手，取得理论和实践杂糅后的新综合这一路径。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纲领，主要来自西方的功能论作为工具。功能论是当时国际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潮流，由于功能派的出现，使得社会研究的解释工具发生了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变，前者注重结构形式，后者注重活动和功能。^① 功能论注重各因素的相互依赖性，而不仅是单一的因果关系。功能派之所以受到吴文藻的青睐，就在于它的实用性，以及不唯理论的特征。也因此，吴文藻对涂尔干学派的“讲坛理论”持批评态度，而对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实地研究给予了很高评价。当然，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斯基所秉持的功能论的观点是有差异的，拉德克里夫-布朗偏结构论，而马林诺斯基则在功能论中加入了人性的生物学思想。后者是一种经验文化论，它主要回答三个问题：什么是文化、文化怎样起作用、文化怎样变迁。“文化”概念在吴文藻提倡的社区研究纲领中处于核心地位，它是一个经验的概念，即它不是摆在那里、外在于人的文化。吴文藻指出，“唯有在实际社区生活中切身体验过的，才是真实的活的文化”。^② 也因此，在提出以西方理论为工具的同时，吴文藻提倡实地研究，即到实地中去，发展中国的社会理论。他先后派自己的学生到全国各地不同社区去做实地研究，期待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视角，在社区比较研究中逐步认识中国社会。显然这一社区比较的视野主要受启发于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理论观念。可以说，吴文藻的这一主张深刻影响了费孝通。费孝

^① 参见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14~215页。

^② 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42页。

通早年的社区研究深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论影响,这也是他晚年反思的对象,即在他的社会研究中,出现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弊端。^①

早期社会学本土化除这一特征外,还包括中国社会学人的服务中国之志。这些学人走了一条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路线。^②因此可以说,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一直是相伴而生的,无论是本部分讨论的社会学的本土化道路,还是下一部分论及的社会学的“主体化”路径,都是如此。

以费孝通的学术历程为例。费先生出生于1910年,学术生涯开始于1930年代。在中国积贫积弱之中,他开始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志向便是为了“救中国”,^③他立志不在玄妙的概念上费脑筋,^④而是进入中国的农村生活,到最基层的实践中去探求社会发展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他的社区研究之路。

他早期的经典作品《江村经济》获得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的盛赞,认为费先生开启了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马林诺斯基认为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即人类学家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探究自己所在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服务于自己的国家、社会和人民。马林诺斯基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研究自己人民的人类学是实地调查工作者最艰巨的、但也是最有价值的成就”。^⑤据费孝通后来的回忆,马林诺斯基对费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一个“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为人类服务”,竟流露出“时感令人嫉妒”之情,甚至他表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他用了“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来贬责当时的许多人类学者。^⑥相比于那些将研究地点选择在异域他乡的原始部落的学者,或者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以及那些将人类学仅视为一门满足好奇心的“艺术”的观点,费孝通的“学以致用”品格在其中显得尤为不同。事实上,这种品格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用知识

① 参见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费孝通全集》第14卷(1992—199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226页。

② 参见应星、吴飞、赵晓力等:《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86~200页。

③ 费孝通于1999年4月17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更为深入地谈及这个问题,参见费孝通:《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5~14页。

④ 参见费孝通:《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第3~11页。

⑤ 马林诺斯基对费孝通说,要珍惜以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社会这种优越的条件。参见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第111页。

⑥ 参见费孝通:《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一》,《读书》1997年第9期,第6页。

“为万民造福”。费先生生逢社会剧变、国家危急之际，他选择了社会学人类学，就是想学习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科学方法，用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有所为而为之。^①

在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后，费孝通再次表达这样的心曲：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而服务的，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和国家。他回顾自己作为一个生活在1930年代的中国青年，当时他就觉悟到若不解决民族和国家的前途问题，也就谈不到个人的出路。也就是说，要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局时代里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自认为有意义的人，就必须对中国社会有清楚的理解，基于此，费先生认为需要摸索出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他一贯的研究诉求是志在富民，即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也就是说，只有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而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它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田野，很多研究者都通过走入农村、城镇等社区去观察和体验现实的社会生活，提取社会理论。社会生活本身对于社会学具有独特的价值，费孝通明确提出，“社会生活本身归根到底是一切社会知识的来源”。^②他所在的社区研究学派就是为了回应这样的学术旨趣，而社会学调查就是通过实地观察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社会。费先生指出，相比于他的前辈人类学家（这里特指马林诺斯基），在他这代人类学家里，应当承担起所处国家和时代给予的任务。马林诺斯基研究土著，终究难以跨越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鸿沟，例如马林诺斯基的作品中不时出现土著人对研究者的调查活动生发反感的文字。费孝通认为，如此这般，马林诺斯基的研究就难以成为改善当地人生活的工具性知识。当然，费孝通意识到，需要有比前人更大的勇气和才能，才可能真正实现一个使科学知识完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他认为社会学人类学的特点是研究人的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结合得比较密切。所以，我们对一个学者的评价决不能忽视他所处的时代及其在这个时代里所处的地位。我们既要从他的具体处境里去理解他在推进时代前进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要看到他的时代给他带来的局限性。

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客观性的意思：“科学调查的任务就在于它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它不应当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依据。它服从于客观事实的要求而不服从于主观的不符合实际的行政意向。它固然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它只

① 参见费孝通：《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第5页。

② 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第110页。

提供客观事物的知识。”^① 费孝通对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诠释：“对解决实际问题做出决定的是政治工作者，科学工作者不应当也不可能代替政治工作者去为实际问题做出决定，科学工作者只为政治工作者提供实际情况和意见。”^② 而科学的作用不仅包括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还包括启蒙他们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社会学通过研究，把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如实地反映出来，以充实和提高人们对这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认识。费孝通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学者的这种使命感要更强烈一些，这是社会科学的新境界，而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完全可以帮助人类摆脱改造社会的盲目性和被动性，进入科学性和主动性。因此，作为研究者，要具有对被调查者负责任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制度里，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社会后果的估计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且是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社会研究怎样日臻于科学化的问题。费孝通坚守的一个原则就是：社会调查的目的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的利益，科学的、对人民有用的社会调查研究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认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

费孝通自述，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与以往大为不同：这项调查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改善当地人的生活。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幸福，而且这项工作不仅符合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要求，还与政府在民族方面的工作开展相适应，因此工作起来十分愉快。归根结底，这样的研究不是为了提出理论，而是为了实际的目的，是为了给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在新中国，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志向：社会研究要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福祉。费先生在1996年的学术反思中强调，中国的社会发展带动了他的社会学研究：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他就不会去思考那么多问题；他的想法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是从实际生活中观察到的。他强调，社会学离开了实践，不可能有新东西出来；学者的任务就是要紧跟现实变化，“去抓住它”。^③

三、社会学本土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主体性再发现

众所周知，费孝通晚年的学术思想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变，提出了著名的

① 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第113页。

② 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第113页。

③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5卷（1995—1996），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370~371页。

“文化自觉”概念。这个转向大致开始于1990年代。事实上，这个转向本质上就是找回中国文化主体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仅是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的问题，更是找回扎根于中国本土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后者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全方位找回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意味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历程进入了一个深入的阶段，本文称之为社会学的“主体化”阶段。这个主体性首先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性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当然，在学科建设中，找回主体性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需要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诚如费孝通在《孔林片思》中的思考。要凸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和意义，将中国作为方法，让我们更加自信地立足于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这也是费孝通所说的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以及建设一门学科的艰巨性之所在。这些想法源自费孝通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十年经验，从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的社会学任务是：“跟上中国农村变革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步子，认识它，认识这种变革和发展，并将它们记录下来。”^①到1990年代，费孝通指出，简单总结地域发展模式的方法有些不够用了，需要突破既有的认识。

费孝通的切实关心是中国怎样才能真正变成一条龙？1992年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了更多的内容。他认识到，除了经济上的全面发展、总体战略设想外，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在《孔林片思》中，具体指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的观念，就是中国文化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费孝通认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的主要内容。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费先生认为，既往他的研究关注人们的生活水平，属于“生态”层面，而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与人如何相处显得尤为重要，进而，他思考问题的重心由“生态”转向“心态”。费孝通认为，人与人相处，不仅限于我们一个国家之内，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也要纳入其中。他指出，不同国家之间的人与人的相处问题需要重视，它不仅是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在解决经济问题时，甚至“心态”还可能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要素，至少是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费先生甚至认为，“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②他指出，人类要在这个问题上足够觉醒才行。

简言之，社会学的“主体化”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意涵。

① 费孝通：《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第3页。

② 费孝通：《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第4页。

（一）文化自觉是走向“主体化”的首要条件

笔者认为，费孝通社会学思想从本土化到主体化转向的关键，首要条件便是找回文化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认同梁漱溟对待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在梁漱溟看来，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造就了三种人生态度：西方人注重物质外界，力图改变环境，满足生活的物质需要；中国人不尚争斗，力谋人与人之间友爱共处，遂生乐业；印度人则纠缠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永远调协不了的矛盾里”。^① 费孝通认为西方文化的理性文明促进了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忽视了人与人相处的学问，而且比较容易形成一种极端对立的思维，如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天人对立思维等。而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人和物的思考方面，科学化有所不足，但在人与人相处方面，则充满了亟待总结的智慧，颇值得其他文明借鉴。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充分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但更要明白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能共同生存下去，如此，人类社会才会有一个可持续的和谐共存以及发展。费孝通认为，这是应对21世纪全球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需要整个人类的足够警醒。

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与人的相处更是一个突出问题。费孝通形象地指出，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对于人与人的相处，古今中外都有所研究，但又都有其局限性。例如弗洛伊德从病态角度去研究，孔子虽说是从正面入手，但他所讲的人伦关系又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而不能对今天提供直接的指导意义，因而只具有参考意义。费孝通将21世纪定位为全球性的战国时代，他认为频发的国际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体现了心态失调的问题，为了应对新的处境，需要提出新的人与人相处的理论，这种新理论不仅需要了解国内的社会关系，还需要深入理解国际的社会关系。费孝通认为，通达这条路的途径就是“对人的研究要从生态的层次进入到心态的层次”，而“只有紧紧抓住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才能悟出一些道理来”。^②

费孝通从中悟出的一个概念是“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他找回的文化主体性的核心，颇值得我们后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思考。“文化自觉”是费先生1997年提出来的。代表了他对人文价值再思考的新高度。他认为这个概念正是为了应对当今经济全球化而提出的，因为在多文化接触中，人的心态问题尤为重要。而“文化自觉”是一个促进人和文化的自明理论，就是促进人们理解“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

① 参见费孝通：《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第5页。

② 费孝通：《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第7页。

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① 这一问题意识同时又是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百年社会变迁的处境中生长出来的。如费孝通所说，从20世纪前半叶起，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其中，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中西文化之争甚至今天还在继续。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前，多数学者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后，西学文化的地位大有上升之势，表现为思想解放运动对旧文化的去除，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倡扬。其中发生了“科学和玄学”及“民主与独裁”的思想争辩。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马克思主义是其基本主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社会还处于现代化的征程中。

在现代化征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问题仍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之一。费孝通晚年的学术反思提出，人文学科就是要以认识文化传统及其演变为目的，譬如，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念，这就是“文化自觉”。在中国面向世界的过程中，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然后才谈到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去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② 文化自觉概念，事实上，首先就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好的因素给阐发出来。费先生在《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中提及，他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就是想表达一个愿望：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考察中国文化的天人观。^③ 在追问何为“文化自觉”时，需要回答我们的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绕不开对传统文化思考。费孝通指出，我们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他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时，认为自己从小学到博士，接受的都是新学，没有产生中西文化冲突的感觉，但在晚年的反思中，费先生比较赞赏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态度，如梁漱溟、钱穆、潘光旦等人，上一代人对传统文化有归属感，“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④ 费先生也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归宿。

文化自觉的含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

①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群言》2003年第4期，第18页。

②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6卷（1997—199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③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7卷（2000—200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④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群言》2003年第4期，第19页。

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总结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即中国文化主体性内容）包括：重视家庭的思想，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等。^①他认为，找回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大体上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这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的方向发展而来的。^②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经由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智慧，是可以普遍化的，而且可以成为贡献给世界的智慧。费先生再次批评西方文化尽管在科学技术方面走在了前面，但却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也是世界冲突不断的主要原因。费孝通提出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任务，内容上包括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目标是“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③这要求我们一方面掌握自己的文化，更新创造中国社会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要了解其他文化，处理好文化接触问题。

在全球社会交往中，费孝通对西方文化的局限性看得比较清楚，主要是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比较强。费先生提及自己之所以能轻易跨越“文野之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致。与西方相比，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夷夏之别，但孔子一向主张“有教无类”。费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和西方人相比是有根本区别的。西方人的典型观念是天人对立论、文明冲突论，他对西方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单线进化论等形形色色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批评。^④费先生认为自己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下，能够做到不排斥外来文化、拒绝复制“文野之别”。^⑤晚年的学术反思让费先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的价值，由此深化了潘光旦的中和位育新人文思想的

① 关于推己及人的相对系统的讨论，参见费孝通在潘光旦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费孝通：《推己及人》，《读书》1999年第12期，第21~24页。

② 参见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群言》2003年第4期，第18~21页。

③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群言》2003年第4期，第21页。

④ 参见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第17页；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7卷（2000—200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

⑤ 参见费孝通：《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一》，《读书》1997年第9期，第7页；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第18页。

意义。^① 费先生也由天人合一观，认识到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统一和协调发展，而不能割裂去看。^② 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都需要以此为基础。中国的文化转型还要避免跌入西方文化霸权的陷阱，这就需要反思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简单思维方式。他认为，“要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者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③ 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应该是其中的一个解决思路，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例如古代犹太人在中国的经历。一般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宗教观念非常强的群体，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里，在中国的犹太人逐步融入中国社会中，没有发生像在西方社会那样，由于受到压制而不断强化民族宗教意识，甚至发生冲突的现象。

在构筑文明间交流的规则方面，费孝通秉持的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费孝通指出，当今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应该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来看待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而文化上的唯我独尊、故步自封，对其他文明视而不见，都不是文明的生存之道。因为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其精华和糟粕，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世界文明共存共荣的根本出路。^④ 费先生指出，在探索关系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宏大的、长远的课题时，我们的思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感；要充分利用全人类的智慧，发挥多学科、跨学科的优势来进行研究。而转折时代的伟大思想者就来自这样一些具有博大、深邃、广阔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的代表人物，费先生称以前时代的这类人物为“圣贤”。在当今时代，这类人物一定是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晶，是全体人类智慧“合力”的体现。他认为，我们需要在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中，构建起新的更广博的知识体系。^⑤ 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概念，以及对由生态

①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7卷（2000—200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312页。

②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7卷（2000—200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③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第17页。

④ 参见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下）》，《群言》2005年第2期，第16页。

⑤ 参见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第18页。

到心态研究转向的深入思考，就受启发于他的俄国老师史禄国等人，^① 这样的思想观念也是不同文明交融的成果。

（二）主体化的核心在于“人”：文化是为人服务的

相比于社会学的本土化，要推进社会学的“主体化”发展，不仅要找回中国文化主体性，更要进入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这便是重新重视社会学对人的研究思想。可以说，社会学主流范式研究的多是“局势”问题，而所谓“局势”，还是一个“外在”的、看起来更为宏观的层面；事实上更“内在”的或根基性的存在还需要回到人本身。费先生对人文价值再思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面对现代化或全球化的浪潮时，落后国家和民族是保留文化还是保留人？费先生认为，文化是为人服务的，保留人是他的答案。这也是他反思人文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当然，文化转型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人”本身就具有文化性。^② 对“人”和“文”关系的思考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思考的议题之一。^③ 笔者认为，“内在”的人是“外在”（“局势”）基础和条件，文化主体性的深层是对该文化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发现，尊重人的主体性。2003年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提到，理解人际关系有一个重要的角度，那就是从“主体”的（subjective）、第一人称（我）的角度理解人。事实上，这涉及“个性”的问题。费先生提到的“讲不清的我”，也就是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甚至是潜意识层面的“我”。当然，它的背后也是受文化因素影响的，即除了纯粹的生物的“我”，“讲不清的我”也很难摆脱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中的“意会”说的就是文化中的“说不清”的问题，即“不言而喻”“言在意外”的部分，费孝通认为，这是最常规、最平常、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应该是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核心的部分，它如此深入融入生活细节，以至于人们觉得无须说出来，甚至意识中都没有出现。费孝通认为，这是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琐碎，却是一种活生生的、强大的文化力量。它是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网，对人们的生活细节发挥作用，制约着人们的每时每刻的生活，对社会的作用实则比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更为深入和有效。

① 参见费孝通：《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5~14页；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读书》1994年第4期，第41~54页。

② 费孝通在《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反思》中对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4卷（1992—199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224页。

③ 参见费孝通：《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一》，《读书》1997年第9期，第3~11页。

事实上，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角度来看，文化主体性的最内核的那部分，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个性”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影响费孝通晚年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潘光旦先生，这表现在1993年费孝通在《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对潘光旦早年批评他的《生育制度》的回应，事实上基本认可了潘先生的批评，费先生指出了自己既往的“只见社会不见人”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强调了社会学研究人的重要性，尤其是认为找回人的生物性假设是必要的。在2003年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费孝通强调潘光旦的“位育”思想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位育”思想是潘光旦的以人为中心的新人文思想的重要组成要素，因此下文在阐发文化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方面，除了费孝通的思想，还补充了潘光旦的相关论述，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学的“主体化”转向的深层特征。

就人的“个性”而言，潘光旦的“两纲六目理论”就涉及这一观念，“两纲”是说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个人的一纲包括个性、通性和性别，分别对应着社会一纲的文明进步、社会秩序和种族绵延。潘光旦认为，人的个性和文化的进步是相对应的，一个理想社会应该允许“个性”存在并培植比较有个性的人才，否则社会秩序方面是有保障了，但文明进步则有所不足。^① 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提及李白创作诗歌的案例，事实上也是诗人个性生发文化性创造的个案，李白的个性化创造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他的诗歌经由代际传递，重新影响和塑造了我们文明的某些方面，不过李白在世时，常常是不得志的。对此，我们在《蜀道难》的寓意中便可略知一二。

对于个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问题，潘光旦的理论给出了处理方法，这其实也是儒家的方法，那就是“中庸”思想。潘光旦认为，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取得和谐发展的。这一方面要求社会给予个性一定的尊重，另外，个人也不能要求绝对的自由（即自由不能“泛滥无归”），他认为最高的自由境界是70岁后孔子所达到的境界，那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如《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走到费孝通这里，主流社会学界找回了我们文化的主体性，而且论及了文化主体性的最核心部分，这便是人的主体性问题（例如费先生对“讲不清的我”的讨论）。费孝通认为，在对各

^① 参见潘光旦：《自由之路》，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6页。

种文明基础和特质进行研究时，就要谈到关于“人”“人性”这些更为基本的问题。而文明、文化的根本都是关于“人”的事情，所以要搞清楚文化和文明还得从“人”入手，要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① 费孝通明确指出，在民国时期的人生经历中，他是将个人生活和学术研究截然分开的：他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研究对象是农民的生活。这个时期也没有体会到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经历“文革”后，他切身领会到超个人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个人生物性的顽强表现。1993年他谦虚地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学力还不够做更深入的体会和分析，^② 大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自己早期的研究是“只见社会不见人”。费先生认为，强调社会结构的取向在本质上是受社会物理学研究观的影响所致，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社会观就是如此，^③ 但人的维度颇值得社会学家去深入研究。从实用的角度看，社会的目的还在于使个人能得到生活的满足，而“能行为的个人是个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他知道需要什么，希望什么，也知道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还有什么期待。满足了才积极，不满足就是消极”。^④ 费孝通认为，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生态），还要看到人（心态）。

笔者认为，潘光旦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人性问题，他自觉将个人和社会间的张力作为其理论要处理的基础问题，他的新人文思想也是建筑于其上的。潘光旦明确指出，个性是文明进步的基础，并认为社会应该适当尊重和培育个性，激发天资良好的人的创造力，为文明进步贡献力量，否则社会徒有秩序，而活力不足。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潘光旦的处理方式是儒学为体、西学为用，他的目标也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些思想资源都有助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的逐渐深入，有助于社会学在“主体化”阶段的探索。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试图聚焦于费孝通的学术历程，回顾百年来与中国社会剧变相伴而生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及其转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

① 参见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下）》，《群言》2005年第2期，第14页。

②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4卷（1992—199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③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7卷（2000—200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④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4卷（1992—199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从“本土化”到“主体化”的发展阶段。所谓本土化更多指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路径。以费孝通的学术历程为例，这一本土化历程，包括借鉴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以及一些理论假设，也获得了认识上的新综合。在这一阶段，费孝通的学术之路从“从实求知”开始，以“志在富民”为取向，其研究特点是偏“生态”层面，研究的目的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偏器物层面的，尚未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主要思考内容。本文提出的社会学的“主体化”阶段，与费孝通晚年的学术反思有着直接关系，费孝通经过漫长的学术反思，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认识中国社会和推进中国社会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中，出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而人的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几乎是同时提出来的，费孝通晚年的学术反思也是从主流社会学研究“只见社会不见人”开始的。1980年，当他将人的主动性纳入思考范围后，^①中国文化的主体问题也得以凸显。此后，中国文化在处理社会发展问题方面的优势（如强调“和而不同”）越来越得到费先生的重视，这也成为他构建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例如他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明确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对于发展中国社会学人文性的意义。本文认为这属于社会学的“主体化”探索阶段，当然，目前我们还处在这一进程之中。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主体化”探索阶段，并不意味着“本土化”阶段已经结束，二者并行不悖；即便在“主体化”阶段，也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借鉴外来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

可以说，无论是在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阶段还是在社会学的“主体化”探索阶段，社会学的学科发展都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更具体地说，无论在哪个学科发展阶段，社会学的学术研究都在回应时代主题，即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社会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学的基本品格。费孝通的学术品格较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可贵品质。那就是，将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完全是为了救中国之志；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费孝通的学术生涯开始于1930年代，他生逢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时代，他在那样的时代得出的一个结论便是：不可再从书本中求得知识，而应该到实地去，获取关于老百姓的生活的知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他走出了一条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道路，

^① 费孝通在1980年有两篇文章谈及人的主体性问题。第一篇是《与医学心理学者谈社会学》，谈到人的行为不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精确翻版；第二篇是《社会学和企业管理》，从人的能动性角度谈及劳动积极性问题。参见费孝通：《与医学心理学者谈社会学》（1980年7月）、《社会学和企业管理》（1980年11月），《费孝通全集》第8卷（1957—1980），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443页。

他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发现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用所学的知识服务于人民的切实生活需要。这便是从实求知、志在富农的意涵。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定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学曾被短暂取消过（1952—1978年）。在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后，费孝通坚持志在富农的主张，继续践行从实求知的方法，他的田野调查范围有所扩大，从广西的花篮瑶社区、江苏的开弦弓村和云南三村扩展到全国各地，并写出了《行行重行行》，不断启发我们这些后来人该如何做社会学研究。通过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调查，以及他自己学术之路的反思，在1990年代他进入了全面的学术反思阶段，事实上，他是在借个人的学术反思，来思考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历程及其局限性，并试图为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建议，他的反思指引出了社会学的“主体化”探索问题。他的思考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今天的社会学发展应该直面我们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为社会发展作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①可以说，中国社会学随之也进入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时代，即社会学的人文转向。费孝通强调社会学应该发展其人文性的方面，认为社会学的人文性知识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而健全的人的建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费孝通启发我们，经过社会学的百年本土化历程，找回文化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是必要的。在这一倡议下，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②

（责任编辑：温莹莹）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16页。